

香港近一百五十年印壇輯要

劉浩敏

香港在嶺南印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，早於 1930、1940 年代，因戰亂而移居香港的金石家篆刻家逐漸遞增，或流寓、長居香港，或遊走於粵港之間，他們藉由教學、雅聚、出版、展覽及結社等活動，奠下了香港印壇的發展基石，所涉印人、學者，或具影響力的人物與活動，不勝枚舉。

儘管如此，香港並無篆刻史的專著，探究斯學者寥寥無幾，近百年來僅有文章數篇。香港當代印人鄧昌成於 1988 年首撰〈香港篆刻發展概況〉及篇幅相近而發表於不同刊物的文章，如〈香港篆刻發展史〉（1989）、〈香港的篆刻的發展與回顧〉（1995）等，對 1940 至 1980 年代的香港篆刻發展作一概述，並摘錄其所知見的一手資料，為香港印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鑑。¹ 繼有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唐錦騰發表〈香港早期印壇概述〉（2005）一文，揭示了 1940 年代或之前所涉的印學事跡，對於增補印學史料，並理解尚處於發展雛型之香港印壇，均具助益。

2

有關香港印人的資料，載籍零散，且多從粵域文化的視角切入，範圍廣泛；相關考述早見於鄧爾雅〈印學源流及廣東印人〉（1947），後有余祖明編《近代廣東印人遺作彙輯》（1974）、馬國權（1931–2002）集廣東及近世印人編成《廣東印人傳》（1974）、《近代印人傳》（1988）等，涵蓋了不少香港的印人事跡。³ 另外，本地個別印人集自刻印成譜、數家合輯者，或展覽場刊等，較常見於 1990 年代或以前，不單保存了珍貴的歷史記錄，也可藉此窺見香港印壇一隅。

¹ 參鄧昌成：〈香港篆刻發展概況〉，載《印林》（1988 年 10 月第 53 期），頁 50–54；鄧昌成：〈香港篆刻發展史〉（上、下），分載《書譜》（1989 年總第 86 期），頁 76–77 及《書譜》（1989 年總第 87 期），頁 63–68；鄧昌成：〈香港篆刻發展史〉，載香港友聲印社編：《香港篆刻報》（1989 年 3 月第 1 期），頁 1 及 8；鄧昌成：〈香港的篆刻的發展與回顧〉，載林漢堅編：《香港視藝年刊（1993–94）第一期：正反》（香港：香港視覺藝術研究會，1995），頁 83–85；鄧昌成：〈香港篆刻發展史〉，載林亞傑、朱萬章編《嶺南書學研究論文集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 130–135；鄧昌成：〈香港篆刻發展史〉，載《香港篆刻名家作品集》（香港：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，2005），書後（無頁碼）。

² 參唐錦騰：〈香港早期印壇概述〉，載莫家良編：《香港視覺藝術年鑑 2005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2006），頁 145–182。

³ 鄧爾雅：〈印學源流及廣東印人〉，載《南金》（香港：南金學會，1947 年創刊號），頁 13–16；余祖明：《近代廣東印人遺作彙輯》，台灣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74；馬國權：《廣東印人傳》，香港：南通圖書公司，1974；馬國權：《近代印人傳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98。

近年來，內地學者對廣東印學發展的梳理漸次重視，成果顯著。2010 年中山大學圖書館應商志〔香覃〕（1993–2009）之囑，重新校訂冼玉清（1895–1965）《廣東印譜考》，⁴ 為迄今彙輯廣東印譜數量最多的一部，所涉考證不乏香港印跡。2016 年由「嶺南印社」、「嶺南書畫院」首辦「嶺南印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且集論文 48 篇輯成《印說嶺南：嶺南印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雖並非以香港印學為側重點，但旁涉香港印人印跡者逾十篇。⁵ 另有郭守運《嶺南篆刻藝術史論》（2017）、梁曉莊《嶺南篆刻史》（2017）等專書，皆在探討嶺南篆刻的同時，對港、澳地區有所涉獵。⁶

概言之，香港在嶺南篆刻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可惜資料零散不整或匱乏待考，專題研究幾乎處於空白，若要重構嶺南印史，香港印學的地域研究實在不容忽視。

香港為嶺南印學發展的重鎮

香港印史肇始於 1872 年。晚清篆刻家徐三庚（1826–1890）應友人王韜（1828–1897）之邀自滬來港，曾刻「弢園藏」（1872）一印並有款記：「紫詮老友審之。壬申中秋，將之五羊城，道經香港製此。徐三庚記。」是迄今所見最早的香港印跡。⁷ 1909 年，著名印人齊白石（1864–1957）因欽州之行路經香港，逗留八天。據齊白石《寄園日記》載，欽州之行是應郭人漳（？–1922）之邀，前後約半年之久，期間作畫二百五十餘幅，刻印二百八十餘石。過港時，友人李鐵樞（生卒不詳）為其古琴乞求齊白石篆刻「天語」二字。⁸ 終究其所刻「二百八十餘石」中有多少在港所製，則沒有記載，又因作品散佚，無從而知，然卻為香港早年印壇留下重要的印記。

源起於晚清的香港印史，一直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，原因是中國印學研究起步較晚，缺乏文字記載，保存意識淡薄，研究方法尚未成熟，而且書印同源，相輔相

⁴ 冼玉清：《廣東印譜考》（校訂本）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0。

⁵ 徐暢、曲斌編：《印說嶺南：嶺南印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16。

⁶ 參郭守運：《嶺南篆刻藝術史論》（廣州：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 156–158；梁曉莊：《嶺南篆刻史》（廣東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 467–469。

⁷ 參郭鋒利：〈徐三庚遊粵攷〉，載《印說嶺南：嶺南印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2016），頁 175–179；並參唐錦騰：〈香港早期印壇概述〉，頁 145。

⁸ 參齊白石：《寄園日記》（石家莊：河北美術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 70–72；並參蕭芬琪：〈齊白石香港七日遊〉，載黎健強主編：《形彩風流—香港視覺文化史話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2），頁 90–92。

成，故常被相提並論，印相對易被忽略，研究者不多，於香港尤甚，仍有大片空白有待填補。然而，在香港印學歷史進程中，必要提到的兩個重要階段，分別為：（一）發展關鍵期（約 1940、1950 年代）：香港成為嶺南印學文化傳承的據點，印人、金石學者、收藏家避地香港，並攜同珍貴文物逃難於此地，免遭兵災，印人印跡漸多，這時代背景促成了香港印壇往後三十年長足的發展；（二）高峰階段（約 1970、1980 年代）：前人的實踐發揮一定影響力，本地的印人和活動日趨頻繁，並積極推廣印學，連繫國內外，包括中國內地、台灣、日本、韓國等，在推動並延續嶺南篆刻佔有重要地位。

（一）、發展關鍵期（約 1940、1950 年代）

1940、1950 年代，粵地人才和文物流轉至此，使香港成為文獻保存、甚至嶺南印學發展的要地。1940 年，葉恭綽（1881–1968）發起組織「中國文化協進會」聯合在港文化界人士，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舉辦「廣東文物展覽會」。此展的參觀群眾達廿萬人次，並出版了《廣東文物》一書，不僅詳細記載了整批文物流轉及保存的情況，也收錄了大量珍貴文物資料、圖片及相關文章。⁹ 與金石篆刻相關者，包括：廣東歷代官私古璽，以及清流派印章、印譜及印學論著等，所涉粵籍印人包括：謝景卿（1735–1806）、黎簡（1747–1799）、陳澧（1810–1882）、柯有榛（1814–1885）、朱光夜（生卒不詳）、潘儀增（生卒不詳）、李文田（1834–1895）、梁于渭（1842？–1913）等。當時任「香港書畫文學社」主持兼本地多間美術報的編輯羅元桐（1889–1942）曾撰〈觀文物展覽會書感〉一文，記錄了本地印人簡經綸（1888–1950）在會場刻印的情況。¹⁰

1949 年，香港始見最早的印社，何筱寬（1916–？）在中環同文街辦「藝一印社」，起初替人刻私人圖章、商號用印等，後來經營書印家的中介代理，兼辦展覽、銷售材料工具等業務。¹¹ 唐積聖（1927？–2010）嘗於「藝一印社」工作，主要負責刻印，善刻各種木、石、牙及玉等材料，據其憶述，本地名宿鄧爾雅（1884–1954）常留連於該社，甚至會即席篆刻掛單稿件，其學生張祥凝（1909–1960）、劉玉林（1901–1950）往往跟隨，朝夕旁聽。另，馮康侯（1901–1954）、羅叔重（1898–1968）等也經常到訪，互相談印論藝。¹²

⁹ 參廣東文物展覽會編：《廣東文物》（全三冊），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3；並參黎樹添：〈馮平山先生與圖書館〉，載《香港圖書館協會學報》（1984 年第 8 期），頁 51–56。

¹⁰ 羅元桐：〈觀文物展覽會書感〉，《廣東文物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0），頁 260；並參梁曉莊：《嶺南篆刻史》（廣東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17），頁 467–469。

¹¹ 參鄧昌成：〈香港篆刻發展史〉，《香港篆刻報》（1989 年 3 月第 1 期），頁 1 及 8。

¹² 參鄧偉雄：〈略述唐積聖先生的雕刻藝術〉，載唐錦騰編：《香港視覺藝術年鑑 2011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2012），頁 130–133。

這階段或之前，本地不乏書畫團體舉辦雅集、交流及展覽等各種活動，當中或有印人切磋印藝，可是「印社」或「以印會友」為宗旨的組織，則尚未可考。繼「藝一印社」後，有馮康侯組「南天印社」（1962）、趙鶴琴（1894–1971）創「書畫刻三藝學社」（1969）也為重要，但為時較短暫，相對「藝一」雖較少人知曉，卻於其時甚具凝聚力，在香港印壇上具重要意義。

繼後，何筱寬、馮康侯、羅叔重等人更於 1958 年夏首次發起「省港澳篆刻家作品第一次聯合展覽」，在萬宜大廈 2 樓舉行，參與者有 30 餘人，並出版了《現代篆刻合輯》（1958），錄入廿位印人、近 220 枚印鈐，包括：區建公（1886–1972）、趙鶴琴、何秀峰（1898–1970）、李祖佑（1897–1965）、羅叔重、陳麗峰（生卒不詳）、馮康侯、劉焯宇（1904–1985）、陳語山（1904–1987）、陳宗虞（生卒不詳）、黃思潛（1907–1985）、林景穆（1909–？）、易越石（1912–2007）、何筱寬、關則哲（生卒不詳）、何少強（1917–？）、陳秉昌（1921–1999）、林世昌（生卒不詳）、林近（1923–2004）、駱曉山（1924–？）。¹³ 這次「粵、港、澳」三地聯展，以活躍於香港的印人居多，足以反映香港是嶺南篆刻交流及發展的要地。

更值一提的是，其中參展者易越石為本地著名金石家，曾為一同參展的李祖佑刻印一方，以訂二人交誼，印款內容更記載了展前準備的一次聚會，涉各年輩篆刻家共廿餘人；印款刻道：「祖佑先生對金石書畫造詣深湛，且精篆刻，業西醫者能有如此成就者，海內外僅君一人而矣。戊戌四月，為余港第九年，欣逢李府盛會，集同道廿餘人於一堂，商討第一次聯合展覽事，誠為群賢畢至、少長咸集，因索石為刻。此印籍訂金石之交，並希教正，以收良師益友之效，越石誌贈。」（「李祖佑印」，1958）揭示了當時印人活動的真實記錄，可為香港印史補上一筆。

這方李祖佑的姓名印，與其生前自用印合 50 多枚，現藏於香港茶具文物館，為館中重要收藏，刻印者除易越石外，還有：林千石（1918–1990）、馮康侯、何少強、高甜心（1915–？）、簡經綸、張熾良（生卒不詳）、何筱寬、陶壽伯（1902–1997）、張祥凝、許半愚（1914–1968）、羅叔重、方去疾（1922–2001）等，多為香港或粵籍印人。李祖佑雖不以藝名稱著，但嗜好中國書畫、篆刻，與香江藝壇中人來往密切，且收藏金石、書籍類甚豐；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曾於 1967 年購入其藏書共 3,218 冊，其中包括 219 種印譜，對保存文獻，以至推動印學發展，貢獻良多。¹⁴ 惜其在當今印壇幾乎名不經傳，若對其遺藏詳加考證，定對香港、及

¹³ 《現代篆刻合輯》，香港：南洋印刷公司，1958。

¹⁴ 參黎樹添：〈馮平山圖書館簡史〉，載陳炳良主編：《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：

至嶺南印史的補遺大有裨益。

（二）、高峰階段（約 1970、1980 年代）

香港印壇於 1940、1950 年代奠下發展基石，延續至 1970 年代，在前人成果的累積下，新一代印人日趨活躍，積極於交流與推廣印藝，而「香港友聲印社」的成立，更把香港篆刻推上一個發展高峰。

香港友聲印社編《香港篆刻報》（1989）詳細記錄了「友聲」的成立及其活動；1978 年初，鄧昌成、禰紹燦、許文正、陳樹宜、許晴野、李懷謙、陳岳欽、黃植江等，欲效法「西泠印社」（1904）諸子立契組社，正式成立「友聲」。「友聲」取自春秋《詩經·小雅·伐木》：「嘒其鳴矣，求其友聲。」有尋求同伴應聲的意思。在創社初期有社員 11 人，後增至 40 餘人，合中、青各輩，主要社員還有陳秉昌、林章松、何繼賢、孔平孫（1924–2016）、梁秋白、陳禮源、茅大容、彭植良、區大為等，至今部分印人仍活躍於本地印壇，薪火相傳。歷年印行篆刻刊物，包括：《友聲印集》12 集（1978–1987）、《香港勝跡印選》（1982）、《香港四家印譜》（1985）、《中國十大風景名勝印拓》（1988）、《印譜快訊》（1988）、《友聲通訊》（1988）、《香港篆刻報》（1989）及社員個別印譜等，透過定期發表作品、文章，介紹會社活動，切磋印藝，交流成果，深受同行稱道，亦為香港印人和活動的歷史記載。¹⁵

建社十年間，印社活動極之頻繁，「以印會友」的宗旨清晰，透過持續出版、教學、舉辦展覽、交流活動等，把香港印人印藝推廣至國內外。印社曾多次在港款待著名篆刻家，包括：台灣曾紹杰（1910–1988）、梁乃予（1927–2001）、薛平南、黃嘗銘、鄭多鏗，新加坡施香沱、陳岳欽，日本中島春綠，韓國鄭文卿，中國內地錢君匋（1907–1998）、韓天衡、朱關田、余正、陳振濂等，建立起一個獨特的交流平台。另外，跨地區活動多不勝數，重要者計：1983 年前往杭州祝賀「西泠印社」建社 80 周年，並參加了開幕慶典及各項活動，又於 1984 年，與韓國、台灣、新加坡、美國、英國等地篆刻家，聯合在漢城（今首爾）舉辦「第一屆國際篆刻大展」等。¹⁶

毫不諱言，「友聲」可謂香港歷來最具規模、涉及印人數最多的金石篆刻社，其活動範圍之廣，在 1970、1980 年代成為推廣並延續嶺南篆刻的重要樞紐。與

1932–1982》（香港：馮平山圖書館，1982），頁 16–30。

¹⁵ 參香港友聲印社編：《香港篆刻報》（1989 年 3 月第 1 期），頁 1–8。

¹⁶ 同上註。

此同時，香港印壇發展的高峰，兼體現於印章考藏、印學論著等方面；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，金石研究專家馬國權、王人聰移居並活躍於香港，其著錄所涉種類甚多，包括：印史述略、古璽考證、明清篆刻之學派、廣東印學，及近世印人傳略等，斐然可觀，至今仍是海內外印學研究之重要參考。

馬國權曾任香港《大公報》撰述員，兼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，並在中大藝術系任教書法篆刻，多次應邀至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及中國內地講學、舉辦展覽。平生著作等身，以書印著述尤多，在港出版的印學著作計有：《篆刻藝術選集》（1970）、《廣東印人傳》（1974）、《廣東縣市名印譜》（1992）、《名家談篆刻》（2001）等。¹⁷ 王人聰則歷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、研究員及榮譽研究員，在職期間兼教於中大藝術系，其著述以中大文物館印行為主，包括：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》（1980）、《印章概述》（1982）、《新出歷代璽印集釋》（1987）、《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》（1990）、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》（一、二、三）（1996、1999、2001）、《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2000）、《古璽印與古文字論集》（2000）等。¹⁸

這些著述雖非以梳理香港印史為重點，但對香港印人和本地藏古璽有所涉獵，標誌着本地印學的研究成果，至今仍有極高的學術價值。相對於各個時期的印學專論，重要者如：蔡守《印林閑話》（連載於《香港華字日報》）（1919前後）、鄧爾雅《篆刻卮言》（年份待考）、易越石《歷代印學家概述》（1999）、孔平孫《孔平孫印論集》（本名《印文指譌》）（2002），¹⁹ 1970、1980年代的研究成果尤為顯著，成就了香港印學史的高峰。

黃牧甫與香港印壇

香港印學，傳承自廣東篆刻流風，即以黃牧甫（1849–1908）為主流風格的「嶺

¹⁷ 馬國權：《篆刻藝術選集》，香港：萬葉出版社，1970；馬國權編：《廣東印人傳》，香港：南通圖書公司，1974；馬國權、馬達為：《廣東縣市名印譜》，香港：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，1992；馬國權：《名家談篆刻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01。

¹⁸ 王人聰：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1980；王人聰、羅福頤：《印章概述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82；王人聰：《新出歷代璽印集釋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1987；王人聰、葉其峰：《秦漢魏晉南北朝官印研究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90；王人聰：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》（一、二、三）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1996、1999、2001；王人聰、遊學華：《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2000；王人聰：《古璽印與古文字論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2000。

¹⁹ 蔡守：《印林閑話》，連載於《香港華字日報》，1919前後；易越石：《歷代印學家概述》，香港：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，1999；孔平孫：《孔平孫印論集》，澳門：焦點藝術空間，2002。

南派」，因其祖籍安徽黟縣，故又稱「黟山派」，清末民初廣東一帶以其印風最為盛行，影響力遍及香港。究其主因，嶺南名家篆刻之中流傳最廣者為黃牧甫，有多種印譜傳世，現所知見超過60種，存世印鈐逾2,400多枚，因而印貌得以廣傳，從學者眾。²⁰ 事實上，只有少數印人能親受黃牧甫的教益，除其子黃少牧（1879–1953）外，僅有李尹桑（1882–1945）、易大厝（1874–1941）、鄧爾雅、劉慶嵩（1863–1920）可視為嫡系傳人，卻足以為香港印壇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影響，使「嶺南派」在香港扎下深厚根基；且由四人說起，一窺嶺南篆刻延至香港的發展脈絡。

1918年，李尹桑與易大厝、鄧爾雅等人在廣州組織成立「濠上印學社」，大力推動嶺南印學的發展；近世著名篆刻家陳巨來（1904–1984）《安持精舍印話》（1982）道：「近代印人，南有李璽齋尹桑、鄧爾雅萬歲、易大厝熹之三君者，淵源所出，僉出牧甫，各有所擅，未可軒輊。」²¹ 可見三人承襲「嶺南派」在近代印壇上享有盛譽。

李尹桑為黃牧甫嫡傳弟子，在黃氏任職廣雅書局校書堂之時，曾師事其門下約四五年之久。黃氏曾為李尹桑刻印甚多，存世印鈐約50枚，其中一印有款刻道：「此牧甫數十石中不得一之作也，平易正直，絕無非常可喜之習，願茗柯珍護之。」（「師實長年」，1899年或前）受牧甫親炙，李氏繼承了其師完整光潔的特點，深研古璽，悟得平正中求變化的妙處，存世有多種印譜。²² 師從李尹桑的計有區夢良（1888–？）、馮衍鏗（1911–1954）及尹桑之子李步昌（1902–1970）；其中馮衍鏗曾執教於香港，嘗與李天馬（1908–1990）同輯《李璽齋先生印存》（年份待考），又曾集拓黃牧甫刻印50餘成《雙清閣鐵書經眼錄》（年份待考），使黃牧甫及其傳人印貌得以保存。

黃牧甫更於臨終前把生前手鈐自刻印稿《黃穆甫印存續補》（1908）²³ 交託李尹桑，無疑是傾囊相授，視之為傳人。李氏對此譜極為珍愛，但晚年窮困、生活所迫，將此譜歸本地文人學者高貞白（1906–1992），高氏擬付梓廣傳，並請鄧爾雅撰序，惟因故印譜沒有印行，鄧序之原稿亦因印刷公司失火而未能保存。幸而，鄧序曾發表於香港《南金》雜誌創刊號（1947），故序文內容得以傳世，鄧

²⁰ 劉浩敏：〈所知見黃牧甫印譜傳本〉，載《嶺南印記—劉浩敏印學文集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2018），頁122–149。

²¹ 陳巨來：〈安持精舍印話〉，載《印學論叢—西泠印社80周年論文集》（杭州：西泠印社，1987），頁15。

²² 李尹桑印譜見《大同石佛龕印稿》、《李璽齋先生印存》、《戊寅印稿》、《李茗柯璽印留真》、《李尹桑印存》等。

²³ 黃牧甫編：《黃穆甫印存續補》十三冊，其他不詳，約1908年。

序中記載李尹桑對其師用刀技法的領悟：「先生衝刀全依古法，執刀極豎，不異筆正，白文尤顯易見，每作一劃，自起訖收，平直無些子窒礙，如久積印泥，先滌至淨，試以刀輕劃之果然。」²⁴ 相信鄧、李二人均受黃牧甫影響至深。後此譜由高貞白傳至香港印譜收藏家林章松，現為其松蔭軒所藏。此譜為海內外孤本，所錄黃印近 700 枚，多為未見於他譜者，是極珍貴的研究資料。²⁵

易大厝早年藉由在廣雅書院讀書之便常請益於黃牧甫，其印自黃氏蛻化而出，不著意於形貌之模仿，取封泥、急就鑿印等意趣入印，又善於章法佈局，構圖奇崛，在民國印壇中佔重要地位，並有多種印譜見世。²⁶ 除與李尹桑、鄧爾雅等常常互相參研印藝，成立「濠上印學社」（1918）外，後遷居北京，又與羅振玉（1866–1940）、陳半丁（1876–1970）、壽石工（1886–1949）等40餘人組成「冰社」（1921），對嶺南印風的傳播有開拓之功，師承者有簡經綸、潘靜安（1916–2000）、何秀峰等，均為香港早年印壇的中堅人物。

鄧爾雅幼歲即好篆刻，因其父鄧蓉鏡（1834–1903）曾掌教廣雅書院，與黃牧甫份屬世交，雖未得黃氏親炙，乃能私淑之。²⁷ 其篆刻獨宗黃牧甫，廣涉博覽，凡古璽、漢印、魏碑、元押、造像等皆以入印，刀法挺拔光潔，尤善佈局，嘗曰黃印「尤長於布白，方圓並用，牝牡相銜，參伍錯綜，變化不可方物。」²⁸ 曾著多種金石篆刻字書。²⁹ 晚年定居香港，以課徒鬻藝為生，受業於鄧氏有余仲嘉（1908–1942）、張祥凝、劉玉林，另其子侄、繼室皆擅刻印，又與本地印壇中人過從甚密，重要展覽要數由香港「園社」舉辦「鄧爾雅、馮康侯、馮師韓、盧鼎公、林千石嶺南五名家篆刻書法展」（1947），使嶺南篆刻在香港產生廣泛的影響。

承「嶺南派」一脈，劉慶嵩相對較少人提及；其乃黃牧甫友人，人品、學識皆受黃牧甫讚賞，黃氏曾刻「劉聘孫」（1890）一印記：「歲己卯客江西，始知

²⁴ 鄧爾雅：〈黃穆甫印存續補序〉，載《南金》（香港：南金學會，1947年創刊號），書後（無頁碼）。

²⁵ 劉浩敏：〈黃牧甫流派印人〉，載《黃牧甫生平及篆刻藝術之研究》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哲學博士論文，2012），頁121–129。

²⁶ 易大厝印譜見《秦齋魏齋璽印合稿》、《魏齋璽印集》、《大厝印譜》、《大厝居士造像印集》、《孺齋自刻印存》、《古溪書屋印集》等。

²⁷ 謝光輝：〈黃牧甫嶺南印事考述〉，載林明、謝光輝編：《黃士陵印存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23–24。

²⁸ 鄧爾雅：〈黃穆甫印存續補序〉，載《南金》（香港：南金學會，1947年創刊號），書後（無頁碼）。

²⁹ 鄧爾雅著述有《印雅》、《篆刻卮言》、《印賸》、〈印學源流及廣東印人〉、《文字源流》等。

有劉聘孫者，其後五年來粵東，始與相見，又六年再來再相見重，以故知日漸密，領其言論，讀其述作，然後知其蓄積富好慕正，陵當就而攷德稽疑，遂訂交焉。魯語云：『積土累篲可成邱山。』聘孫原據邱山之勢者，知進而不止於乎，其可量哉。聘孫與陵非宴旻一朝之好也，因其行于是乎言。庚寅夏六月，黟黃士陵。」可見黃、劉二人交誼甚深，雖黃牧甫比劉慶嵩年長14年，彼此亦師亦友的關係達廿年之久。劉氏篆刻初宗「浙派」，以切刀治印，後受黃氏影響，改用衝刀法，印風光潔明快、剛勁雄渾。繼有陳融（1876–1955）、馮康侯及其侄劉玉林等師從學印，成為「嶺南派」的重要傳人。

師承劉氏，陳融印風秀逸峭拔，獨具面目，且富收藏，曾以其所藏黃牧甫、劉慶嵩及馮康侯篆刻輯成印譜，包括：《顯園藏石》（1935）、《陳協之先生所藏黃穆父刻印》（1948）、《黃梅花屋印集》（年份待考）等，對黃牧甫印風的流傳起了重要作用。馮康侯則對香港印壇具深遠影響；他早在13歲從劉慶嵩學篆刻，在劉氏的指導下反覆臨習黃牧甫作品，又從其表叔歐陽務耘（1864–？）所藏黃氏印稿、墨跡、印章、款刻獲深刻體悟，一如黃牧甫親授。馮氏印風多樣，刀筆精到，清新俊逸，承繼了黃牧甫一派遺風。1949年前後，馮康侯移居香港，先創「南天印社」、後設「廣雅書學社」（1967），傳授書、畫、篆刻，更嘗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、香港大學校外課程等，首開風氣，在當時造就了不少治印人材，與鄧爾雅、羅叔重、陳語山、盧鼎公（1903–1979）譽為「香江五老」，促使嶺南篆刻風氣在香港蔚然成風。³⁰

自李尹桑、易大、鄧爾雅、劉慶嵩的傳承和發展，黃牧甫之學延至香港的脈絡清晰，淵源有自；其中鄧爾雅的角色尤其關鍵，孕育「嶺南派」在港展開，從學者甚眾，對黃牧甫印藝有傳播之功。1950年代以後，以師從劉慶嵩的馮康侯最能發揮影響力，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幾乎主導了香港印壇，使黃牧甫門下相承不絕，而「友聲」的成立，亦獲馮康侯支持，無論師馮氏門下，或是深受其影響者，皆各有所成，使嶺南一派得以薪火相傳，蓬勃發展。

然若細觀香港印人風貌，也非獨宗黃牧甫一家，他們各有師承，有宗法他派，或自出機杼，尤其進入21世紀資訊發達的年代，地域風格隨之而淡化，創作方向日趨紛呈，面貌多樣，這可說是當代香港篆刻的最大特色之一。縱然如此，香港仍然是嶺南篆刻的一個重要分支，地域主流風格始終以黃牧甫一脈為依。

為香港印學研究奠基

³⁰ 劉浩敏：〈黃牧甫流派印人〉，載《黃牧甫生平及篆刻藝術之研究》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藝術史哲學博士論文，2012），頁121–129。

香港是嶺南篆刻的發展重地，尤其自 1950 年代初至 1980 年代末，以黃牧甫為宗的「嶺南派」延至香港，其淵源、傳承及影響，皆是香港印學研究領域中不容忽視的題目。然而，1990 年代迄今，香港印學尚未蔚為風氣，發展重心轉移內地，雖有個別印人活躍於本地印壇，也有院校或機構舉辦展覽、課程，但在發展上失去了連續性，形成斷層現象。相對於中、日、台等地，當今印學在香港所受重視程度不高，研究成果匱乏，整體滯後，有待進一步發展。

事實上，香港篆刻的發展條件充足，「香江五老」鄧爾雅、馮康侯等早期印人固然春風化雨、名聲在外，續有「友聲」諸子發揚印學，部分仍活躍於當代印壇，卓然成家。院校方面，除了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，還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設系統課程，培育新進，近有「西泠學堂」(2017)於去年在港首辦展覽，展出印章、印稿皆為「西泠印社」珍藏，續於今年開設篆刻課程。另有其他本地團體舉辦交流活動，如講座、展覽等，重要者如「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」分別於 2005、2014 年舉辦的「香港篆刻名家邀請展」，各展集合超過 50 至 70 位不等的印人，並出版作品集，實在難得。³¹

印學研究，以印章、印譜為重要依據，這方面的材料也甚豐富。香港公私所藏印譜現存近 2,000 多種，為國內外之最，其中以香港私人藏家松蔭軒的收藏為重要，次為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 200 多種，惜乏人問津，反映了研究的迫切性。³² 歷代古璽則以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收逾千數最夥，藏印初自北山堂捐贈，後歷年增益，並透過展覽及出版物總結成果，如上述王人聰多種著述可引為例子，並在 2000 年與浙江省博物館合辦「中國歷代璽印藝術」展覽及「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」促進交流，頗有成果。³³ 另外，香港亦為目前於世界上收藏最多元代景教銅印之地，約 990 多枚，為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珍藏，印章初自聶克遜蒐集，繼由利希慎基金會贈予香港大學，其中 700 多件展出於「元代景教銅牌展」(2015)。至於明清至近現代流派印章，則以香港藝術館及其分館茶具文物館藏品為重要，總近 1,000 枚，主要由羅桂祥基金慷慨捐贈，其他捐贈者有簡經綸的學生王漢翹(1914–2005)、丁衍庸(1902–1978)後人劉秉衡(1915–2003)的遺孀馮麗鴻等，其中包括廣東、香港篆刻近 200 枚、涉印人約 60 位，充分反映嶺南印風的豐富多樣，尤具價值，深入後可補足香港印史、以至於嶺南印學之空白。

³¹ 《香港篆刻名家作品集》，香港：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，2005；《香港篆刻名家作品集》，香港：油尖區文化藝術協會，2013。

³² 劉浩敏：〈香港公私藏印譜輯要〉，載《嶺南印記—劉浩敏印學文集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，2018)，頁 16–55。

³³ 王人聰、遊學華編：《中國古璽印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2000。

總而言之，香港存有珍貴的印學研究材料，近年來引起不少國內外學者的關注，尤其廣東印學在近世印壇愈來愈備受注目的趨勢下，有來港蒐集資料、或借鑒本地印學成果，以弘揚中國文化。反觀香港印學，其獨特性和發展本來是別具優勢，但近年卻發展緩慢，學術成果稀少，實應予以重視。後來者當彙整前人的成果，作有系統的史料輯佚，建構本地印學資料檔案，並促進篆刻教育和推廣，使香港篆刻得以推陳出新。本文藉由勾勒本地近 150 年印壇的輪廓，確立香港於嶺南、甚至是中國印學的重要地位，並重申其地域性意義和影響力，冀能為香港印學研究揭示方向。